

论大学生的贫乏

著 / 构境国际成员 & 斯特拉斯堡大学学生

从经济、政治、心理、性关系，
特别是从头脑方面进行观察，
包括一些补救办法

(历史学习资料，仅供学习使用，请勿外传)

论大学生的贫乏：从经济、政治、心理、性关系，特别是从头脑方面进行观察，包括一些补救办法

De la misère en milieu étudiant: considérée sous ses aspects économique, politique, psychologique, sexuel et notamment intellectuel et de quelques moyens pour y remédier (1966)

著 / 构境国际成员 & 斯特拉斯堡大学学生

历史学习资料，仅供学习使用，请勿外传

Union Nationale des Etudiants de France
Association Fédérative Générale des Etudiants
de Strasbourg

DE LA MISERE EN MILIEU ETUDIANT

*considérée
sous ses aspects économique, politique,
psychologique, sexuel et notamment
intellectuel
et de quelques moyens pour y remédier.*

1966

Supplément spécial au N° 16 de «21-27 Etudiants de France»

1966 年原书首版封面

目录

1 / 编者的话

1 / 揭露并张扬这份耻辱，令人耻上加耻。

12 / 只寻求理论在实践中的实现还不够，实践必须发展它的理论。

20 / 破釜沉舟，让局面再也无法反转。

附录（由编者添加）

1 / 告全体劳动者

编者的话（2022）

背景介绍

1968年5月的法国，爆发了一场仅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却能做到波及多国、影响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这场运动史称“五月革命”。国际革命向组织“构境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SI）对这场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革命惨败后，构境国际依然给予这场运动极高评价，称其是“现代无产阶级运动的最重要经验”。然而，早在68年之前，法国国内另有一场由构境者直接推动的小规模学生运动，这场运动在短时间内将革命的种子播撒向了社会各处，为两年后的五月革命做下了充分的铺垫。

1966年5月，法国全国学生联盟（UNEF）斯特拉斯堡大学分会选举学生会（斯特拉斯堡学生总联合会，AFGES）负责人。六名并无行动规划，但已经“臭名昭著”了的不妥协分子最终被学生会官僚安排上了负责人的角色。事实上选举是按照正常程序进行的，但由于大学生对这种选举压根不感兴趣，学生会里的官僚便可以为所欲为。他们把这六名极端分子选出来，是想使他们坐上官僚的宝座，弄他们个骑虎难下。这样，他们虽有反官僚之意，但却不能公开地否定、推翻自己。他们清楚可以战略地利用官僚的地位发挥积极作用，可他们原本所希望的并不是与官僚机构打交

道。这一下，把这六名一向攻击学生会的“反学生”（anti-student）弄得尴尬不已。

不过这六个学生代表没打算闲着，他们一开始便利用自己的位子展开了造反行动。首先在校内成立了一个无政府主义主题的鉴赏向协会，取名为“卡尔·马克思和拉瓦绍尔正名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Rehabilitation for Karl Marx and Ravachol）；之后，他们又拨出学生会资金来宣传其中一位同志安德黑·贝赫同（André Bertrand）创作的变道漫画海报《科隆·杜鲁蒂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Durruti Column），这份漫画的灵感来源于在 1936 年西班牙革命首日建立的杜鲁蒂纵队——一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战士纵队。不过这些所谓的行动都太过无力了。接下来的事，终于能够激动人心。这几个学生灵机一动，打算向社会上已有的革命力量寻求帮助，通过转变社会势态，扭转自己的处境，为自己的行动爆破出天地。于是他们通过同校的朋友，联系上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向组织“构境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SI），开始与构境者（situationist）一同商量对策。

事实上，构境者对学生问题并不感兴趣，他们尤其担心，面对这些无组织无纪律的懵懂学生，自己在行动项目中很容易就会处在领导者的位置，而构境者是实在不想进入这种关系的；他们也担心这样的共事形式会蔓延到社会上，蔓延到自己和学生的这种有限的联合行动之外。而且更不用说的是，这样一场行动

肯定会使构境者和这帮大学生扯上关系，名声受损或许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们也并不认为自己可以拒绝帮助这几个找上门来的学生，因为学生们这次不妥协、不让步的行动，有可能使当下正在形成的新社会运动得到发展。最终，根据构境者们的建议，应当写一篇针对学生也针对整个社会的批判文来转变当前的社会势态。

SI 的联合创始人，法国人居伊·德波(Guy Debord)完成了文章的创意规划，他确定了文章标题和内容主线，以及这份文本的激进程度；而侨居法国的突尼斯人的 SI 成员穆斯塔法·哈雅提(Mustapha Khayati)则起草了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并且定期和斯特拉斯堡的学生及巴黎的构境者对文本的撰写工作进行讨论。这帮行动者就这样一步步地完成了整份文本的撰写。

同年 11 月，那六名学生代表动用学生会资金印刷了一万份《论大学生的贫乏》(下称《贫乏》)的小册子，并选择在开学仪式上进行派发。开学那天，鱼贯进入会堂的学生和教师，每人都接到一份。与此同时，斯特拉斯堡学生会发表声明，声称他们唯一的计划就是解散这个官僚学生会。

这件大学丑闻立即遭到当地、全国乃至国际媒体的强烈谴责，在当时占据了欧洲报纸的头条，一下子把当权者和那些反动卫道士弄得气急败坏而不知所措。当事的那六个学生代表随即遭到学校开除，这是早在他们意料之中的事。除此之外，法院还宣布经正常途

径选出的那六个学生代表不合法，学生会后来也被法院责令关闭（后来又复活了）。当权者发动喉舌，全力收拾残局。但事情已经闹大，构境者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一本二十八页的小册子，撕烂了当权社会系统精心打造的面具。“让局面再也无法反转”，最后一章的标题赫然醒目。

SI 当然没有就此终止行动。出于谨慎，出于对学生后续动作的担心，哈雅提致函斯特拉斯堡学生会（AFGES），要求学生会的学生能够声明自己并非构境者。于是在 11 月 29 日，学生会在公报上作出声明，表示学生会主席团中的任何成员都不属于 SI，但他们全都完全支持 SI 的观点。SI 随后致函学生会主席安德烈·施内德（André Schneider）和副主席安德烈·维赫-皮奥瓦（André Vayr-Piova），表示支持他们所做的一切。从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SI 与斯特拉斯堡学生会的学生们都一直保持着团结关系。

为了对 AFGES 进行神圣的围剿，布尔乔亚、斯大林主义者和牧师，都联合起来了。全学联想要剿灭斯特拉斯堡大学里的构境分子，但尴尬的是，他们在全市 18000 名学生中得到的支持可比 AFGES 要少。但身处资本主义社会的全学联怎么可能孤立无助呢？他们还是获得了大批学贼的拥护，联合了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九个学生社团，并在当地全学联分会的支持下，对学校里亲构境的那几个学生开展了司法镇压行动。12 月 13 日，法院下令扣押 AFGES 的办公室和行政

部门，并禁止了他们为解散 AFGES 而准备于 16 日召开的大会。

司法机器冻结了事态的发展，这导致 SI 的学生同志们必须奋起反抗，走向进一步的斗争。一方面，面对记者的围攻，AFGES 的同志们拒绝接受大多数采访，并且侮辱性地抵制法国国内那些最庸俗的机构（如法国电视台和《行星》杂志），从而迫使新闻界对这起丑闻作出更准确的报道，迫使他们不得不直接去参考 AFGES 自己在公报上发表的内容。另一方面，由于这场斗争当前是在司法和行政方面进行的，而且法律事务局仍然控制着全国学生互助会（MNEF）的地方部门，AFGES 在 1 月 11 日作出反击，决定关闭由 MNEF 控制财务的大学心理援助中心（BAPU）——“斯特拉斯堡 BAPU 的存在是对这所大学所有决心自由思考的学生的耻辱和威胁”（来自 AFGES 的声明）。第二天，BAPU 关门大吉。

1 月 14 日，斯特拉斯堡大学代表团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全学联大会，并在大会开幕时对其动议进行初步表决——他们认为昔日进步的全学联如今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工具，并且呼吁全世界的革命学生，要和国家里被剥削的大众一起，与旧世界的各个方面进行不懈的斗争，同时呼吁解散整个全学联。可悲的是，会上仅有两个代表团支持这项动议。

斗争虽在继续，但团结之火最终却是断了。令 SI 不曾料到的是，曾经身处斗争最前线学生会主席施

内德（André Schneider）和副主席皮奥瓦（André Vayr-Piova），最终对 SI 转变了态度。

事情还得从这说起：一月份，SI 的三名成员由于散播关于哈雅提的谣言而被开除。这三名成员的开除与斯特拉斯堡丑闻无关，但其中两人又恰好来自斯特拉斯堡地区。据 SI 公报所述，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一些学生因为构境者没有打算邀请他们加入 SI 而感到恼火。而被开除的这三个人正是利用这样的氛围，把谣言散播出去，让谣言自己找到学生圈子里那些不懂批判的吃瓜群众。因此，所有被 SI 拒绝的学生都开始摆起自命的“超越”姿态，聚成了一股反构境力量。他们要审判构境者，超越构境者，他们甚至开始相信报纸上的东西，开始将自己意淫为“斯特拉斯堡公社”的起义大众。皮奥瓦也从此不再是 SI 的同志，他和其他的一些人成为了谣言的支持者；而虽然施内德也轻信了谣言，但他在仅仅几天后便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毅然决定以自己的学生会主席身份站出来为 SI 正名。这一下，把那帮反构境者整得不知所措。

校内的事到这里就可以停止叙述了。在社会上，还有一帮滑稽的学者在上演好戏。

比如说这件事。1944 年创办至今，一路标榜独立，不依附政党和财团，也不接受政府津贴，作为法国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的《世界报》（Le Monde），在小册子派发后的几天内发表了一系列支持这份文本的声明，由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阿兰·图亨

(Alain Touraine)、鲍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 等社会学家签署。SI 注重对现实势态的直接介入，所以他们当然不支持这其中的任何一位，即便像阿尔都塞和列斐伏尔这种在马克思主义学界里资深望重的人物，也得不到 SI 的肯定。这帮人的研究虽有价值，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在现实的革命上都确实不著见效，所以 SI 无一例外地将他们视为建制派。同样得到发表的还有一份反构境者的请愿书，由朱利安·弗亨德 (Julien Freund)、安德烈·尼尔 (André Neher) 等哲学家签署。

《世界报》的社论往往反映的是法国政府的立场，但外界却普遍认为该报的政治立场为中间偏左。在构境者看来，这是荒唐的。所以，对一个业已宣布自己要彻底革命的组织来说，是有必要借机会在台面上与这类报纸划清界限的。而他们早就在文中将这份报纸列入了黑名单。他们在文中嘲讽道，大学生“……也相信那格调对他们来说已经太难的《世界报》是一份真正能反映‘客观’事实的报纸，他们以为看了这些书报就能帮助他们了解政治行情，使他们成为这现代世界的一份子。”

SI 在这次行动中可算是见识到了许多学生那愣头青般的蠢笨。整件事情下来，SI 发觉应该令自己在今后的行动中进一步激进化，更具破坏性，更加对现行社会有害。他们希望自己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令那些带着虚伪的折中主义兴趣的家伙不再能接受自己。

SI 其实并不看重《贫乏》的革命性。面对如此庞杂的资本主义系统，一份专门针对局部问题而写的，数来数去还不到三十页纸的小册子，对无产阶级革命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但在 1967 年 10 月，SI 在公报中表示，他们并不完全否认《贫乏》的作用：文本中传达出的一些基本真理可能略微加速推动了落后的法国青年意识到社会中即将爆发的更普遍的危机。不过 SI 对《贫乏》作用的判断可能是专门针对法国的情况的。SI 认为，其它国家的一些青年对《贫乏》有着更加准确的理解，他们已经使得新的社会运动开始更加明确地进行了。比如美国和英国。在 1967 年 3 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罢工引发了一定的轰动，用 SI 的话说，《泰晤士报》评论员很不高兴地看到了他认为已经结束的阶级斗争的回归。SI 所作的批判，通过世界各地发生的具体事件本身而得到加强。在较小程度上，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情况也是如此。比如在 1965 年由荷兰青年成立的一场庸俗无力的反主流运动“挑衅”，SI 对它在 1967 年 5 月的解散并非没有影响。另外，当时西柏林的学生在批判上也有了某些进步……

《贫乏》是造反文学中极负盛名的一部佳作，初版的一万份轰动了全欧洲，后来更是在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中被不断翻印。仅就 SI 所知，翻印数就已经高达三十万份。也有说，光是法国各地的各种野生翻印本就已经达到了三万份。

揭露并张扬这份耻辱，令人耻上加耻。

我们可以这样肯定，除了警察与牧师外，法国大学生是最普遍受蔑视的一类人。他们受蔑视的“原因”是虚假原因，通常是在当权者的意识形态下产生的。而其真正原因——从革命批判的眼光来看——却遭到压制，不被承认。那些伪称反对资本主义的人倒晓得找出这些真正原因，并从中认识自己的位置。但他们却把人们的蔑视倒转过来变为阿谀逢迎。这些无能的左翼知识分子——从《现代》(Les Temps Modernes)到《快报》(L'Express)——沾沾自喜于所谓学生势力的新运动。而正在失势的官僚组织——从所谓的共产党到法国全学联(U.N.E.F.)——争着要给予这运动以“精神”及“物质”上的支持。为什么他们这般热心呢？他们事实上是这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现实里的一个角色。我们利用这本小册子来一一揭发他们的真面目。要避免被这个现实所异化，唯有异化这些带上假面具的人。

到现在为止，一切对大学生方面的分析与研究都失其重心，在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专门性学术里兜圈子。这在根本上犯了傅立叶(Fourier)所谓“有方法的短视”(étourderie méthodique)的错误。意思是说，这类分析往往斤斤计较一些小节，而忽略了大局：学生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但分析的人却没有尝试去

全面了解这个现代社会。他们不停地说这个社会怎样怎样，却忽略了它的商业性与景观性。社会学家像布尔德宏（Bourderon）与帕希丢（Passedieu），他们在他们的探讨中〔《继承者：大学生与文化》（Les héritiers: les étudiants et la culture）〕证明了部分真理后，就无能为力作更深一层的了解。不管他们的原意如何得好，结果总陷入教授式的道德观念里。他们相信康德的伦理观念，相信能由教育制度的理性化来达成真正的民主。换句话说就是教之适应现有的制度。

在普遍的被动中，现代资本主义所导演的景观（spectacle），给每人都强加了一个角色。大学生也不例外。大学生这个暂时性的角色是为了预备他将来在这个商业系统的运行里，担任一个正面的、保守的永久角色。大学生这个神奇角色与历史、个人、社会等现实完全脱节，但它不过是一个起点。大学生被分割于当下与未来两个显然不同的身份里，两个身份间的界限将会以机械的方式来跨越。他们那患精神分裂的意识，使他们能够躲在这个“入门级社会”里（société d'initiation）。他们认不清未来，于是便活在当下，把处于历史庇护下的“当下”当作一个仙境。但大学生的现实是难以面对的。就从经济方面来看，在这个“富裕社会”（société d'abondance）里，大学生仍旧是穷光蛋。他们出身的家庭，百分之八十以上收入超过工人阶级；但百分之九十的大学生，所获却少过最低薪的工人。大学生的贫苦不算是景观社会的苦难，它也没有达到

新无产阶级的新贫苦。当一部分日益增多的年轻人越来越超脱伦理偏见与家庭管束，以便尽早进入公开的剥削关系里时，大学生们仍旧保持他们的一贯作风，固执地做那“少数派”，温顺而不负责任。那姗姗来迟的青春危机或许使他们对家庭有所埋怨，但他们却像小孩子一般，毫不反抗地接受各种制度对他们日常生活的摆布（人家要不是往他们嘴里拉屎，就是对着他们的屁眼撒尿）。

事实上，社会各个领域的事务都已受到殖民地式的控制，而大学生世界是其中最可怕的一个表现。避重就轻，只谈学生问题，是为了掩盖社会上所有人的贫苦与奴役。但我们对大学生的蔑视是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这并不单单是由于他们各人在实际上的贫乏，而且是由于他们对社会上各种贫乏的满意和顺从，由于他们那虔诚接受异化的糟糕倾向。在众人都已经绝望的时候，他们还希望别人对他们特别关心。现代资本主义的要求，将使得大部分的大学生在将来成为基层小职员——堪比十九世纪熟练工人的职能。他们也知道他们那可怜的未来没法填补当下的贫乏，所以他们情愿美化当下，使当下呈现出一种虚假的魅力。未来的日子就像过去一般庸庸碌碌，不能寄以奢望，倒不如躲在这个不现实的当下中。

大学生是苦行主义的奴隶：当权者给他们装上各式各样的锁链，他们却还以为自己很自由。他们就像他们的新家庭——大学，同样相信自己是社会上最独

立的存在。而事实上他们受困于社会上两个最大的权力系统——家庭与国家。大学生是家国手里安分守己、感恩备至的孩子。因此像一个被驯服的孩子一般，他们乐于接受社会系统的各种价值观念、各种欺罔。以前的那些工人是被迫着接受外部灌输的幻境；而这一大批未来小职员意识形态却早已内在形成了。

古代社会的贫乏产生了历史上最大的补偿系统——宗教，而今日大学生的贫乏不过被当成是一个无关重要的边缘问题。他们只能在这被统治的社会下，在被践踏的幻象里，在各式各样的令人异化的产品那滑稽的重复出现中找寻自慰。

法国大学生的思想太落后了。在他们引以自傲的小世界里，受他们崇拜的各式价值与理想，早就已经是站不住脚的幻想了，实际上这些幻想早就是被历史所谴责和嘲笑的。

在旧大学遗留的空誉下，大学生仍旧很骄傲地做着他们的梦。但是他们生得太晚了。从前那些优秀的布尔乔亚文化已经失落。现代教育制度只在于机械地生产一些专家。现代的经济系统需要制造大批不会反思的大学生。大学已堕落为一个生产蠢笨之人的机构。就是连“高级文化”本身也渗入死板板的机器调子，因为教授者们是被流水线式地生产出来的同类型的人——他们中的有些人是连高中生都会对他们口吐芬芳的混蛋。但大学生却懵然无知，依然很尊敬地听训于老师，自动自觉地放弃全部批判精神，以便成为一个认

真学习知识的“大学生”。他们期望从大学教授那里学到这世界的终极真理。这简直是思想的绝经期。在今日大学课堂里所发生的各种事情，都会被将来的革命社会当作有害的社会噪音，而大学生本身就是个糟糕的笑话。

大学生也不曾发觉，就连他那个封闭的象牙塔世界也在受历史改变。那个街谈巷议的“大学危机”不过是现代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个支节、一个各式各样专家之间的哑剧。危机的来由很简单，生产设备正发生普遍的转变，而大学这个特别生产部门追不上社会的整体生产过程。从前，开明的布尔乔亚大学所留下来的古老形象，也由于失去了它的社会根基而庸俗化了。在以前自由贸易的资本主义时代，政府还肯给予一些边缘上的自由。那时候的大学还可以称得上自主自立。这是由于当时的社会需要教育一批少数特权者，使其能负起统治使命。当时的大学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专利品。因此我们不难明白一些老教授有所怀念的感叹：他们情愿保留以前的身份，做未来统治阶级的看门狗——这总胜于做一条牧羊犬：依着经济系统的需求，把一批批羊群带进工厂或写字楼去。只有这批老古董还向往过去，反对大学的技术专家化（technocratisation），他们对未来的那批专家，执着地鼓吹不着边际的“通识”教育。

更严重、更危险的却是那批现代主义左翼以及法国全学联文学院（F.G.E.L.）中的极端分子。他们要求

“改良大学结构”，“使大学重新进入社会经济的生活圈里”。一言概之，就是改良大学，使其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的需求：从前被用来灌输统治阶级“常识”的高等学府，虽然仍保留着它的旧声望，实际上却变成速成中小管理人员的机动牧养工场。这些进步人士，不但没有反抗这个使最后一个比较独立的社会单位受商业社会腐化的历史过程，而且还抗议这个步骤完成得太慢。他们是这种未来的控制论大学（université cyberntisée）的支持者。这些市场系统的现代主义走狗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但对问题的一切辩论都超出学生的思想外。他们无能为力地看着头顶上的主人争论着。就是连他们本身的整个生命也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

大学生极端贫穷的经济情况，使他们只能极可悲地活着。但他们却自满地把微不足道的贫穷，当作一种新颖的“生活方式”：波西米亚式的贫穷主义。但波西米亚式生活不仅并非一个新的办法，它还不可能存在于大学圈子里。如果要过真正的波西米亚式生活，则必须在根本上与大学脱离关系。波西米亚式的学生——每一个学生都自以为有一点这方面的性格——不过是死抓着一个矫揉造作的形象。即便从最好的方面看来，这也不过只是个庸俗的个人解决方案。这些自命“新颖”的人，在赖希（Wilhelm Reich）的著作面世三十年后，仍旧保持着最传统的性爱观；他们之间的两性关系，反映着这个阶级社会的一般关系。大学生

有盲目地支持每一项新运动的倾向，这就显示出了他们的孱弱。由于没有一个硬性的时间表，大学生还能在这个极权的景观展里，得到一些个人的自由。但他们却不晓得好好地利用这自由来进行探险与实验，而情愿躲在这个系统的走狗们给他们安排的狭窄的日常时空里，日复一日。虽然不必像一般人那样分开工作和娱乐，他们却自动地做到这一点；而同时他们又虚伪地轻视那些“好学生”和“为考试而念书的人”。他们接受各式各样的分离，接着又在各个宗教、体育、政治、工会等不同的圈子里去埋怨思想交流的困难。他们愚蠢到自动成群结队跑去向那些跟警察一样的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诉苦。而实际上，这些“大学心理治疗援助组”（Bureaux d'aide psychologique universitaire, B.A.P.U.）却是那些最先进的现代压迫系统为蒙蔽大学生而设立的。

但大学生日常生活的贫乏马上在商品化的文化鸦片里找到了虚幻的补偿品。在景观化的文化里，大学生自然又做起他们忠实信徒的老角色。虽然是近水楼台，他们却无权进入这个“文化圣殿”里，只能像个虔诚的旁观者一样去膜拜这“现代文化”。在这个艺术已死的时代，大学生还是剧院及电影院的忠实观众。他们贪婪地吞噬自助商场里大批销出的冷藏艺术尸体，并且毫无保留、毫无距离、不加思索地投身进去。这是他们的个性。就算那些“文化馆”不存在，这些大学生也会造一个出来。他们的行为证实了美国市场研究

的结论：广告宣传能使消费者在同样无用的商品内作不同爱好的选择（可参见 Perec 或 Robbe-Grillet, Godard 或 Lelouch）。

当为他们安排、制造文化景观的“神”以人的形式出现在幕前时，他们就是主要观众。他们参与那些最猥琐的大众活动，除了大学生外，谁会参加什么“马克思主义”每周讨论会、天主教知识分子联合会？谁会挤满那些拿文学渣滓作垂死呻吟的演讲厅呢？（有五千个大学生参加以“文学能做些什么”为题的大会。）大学生没有真正的热情；他们唯一的欢乐来自“学术明星”，如阿尔都塞-贾鲁第-萨特-巴特-皮卡-列斐伏尔（Althusser-Garaudy-Satre-Barthes-Picard-Lefebvre）之间的冷落论战。而论战题目又总是一些为掩盖真相的假问题，如人道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科学主义（scientisme）、新批评论（nouveau criticisme）、自然辩证法、控制论、元哲学。^①

应用在行为方面，大学生看了戈达尔最新拍的电影，买了辩论者（argumentiste）最新出版的书，便自以为很先进。他们无知到把旧瓶新装，加上糖衣，贴上保护性商标，送入市场的过时思想，当作革命性的新理论。他们唯一的忧虑是怎样保持他们的文化地位，

① 在港台间的“知识小明星”就更糟糕，死去的胡适、殷海光不必说了，现在的，像胡秋原、李敖、徐复观、唐君毅等，都不值得一提，也讲不上有什么论战，最多来几场骂战，把人家祖宗三代都骂到了。——译者注

像其他人一样，他们很骄傲地去购买充塞在书店里，很有份量却又很难明白的书籍的普及翻印本，但是却不懂得怎样去读。那些书只是摆在那儿作装饰品罢了。

他们喜欢的读物，仍旧是一些专门性的，鼓吹文化消费的刊物。他们顺从地接受里面的商业广告，并以此作为鉴赏的标准。阅读《快报》(l'Express)和《观察者》(L'Observateur)成为他们无上的乐趣。他们也相信那格调对他们来说已经太难的《世界报》(Le Monde)是一份真正能反映“客观”事实的报纸，他们以为看了这些书报就能帮助他们了解政治行情，使他们成为这现代世界的一份子。

大学生比其他人更乐意被政治化，而没有注意到这一切不过亦是一场景观而已；还死搂着那四十多年前就被“社会主义革新派”和斯大林的反革命强奸得支离破碎的左派尸体。甚至当权者和劳动阶级也明白了四十多年前的历史，而大学生还懵然无知，更骄傲地去参加那些只能吸引他们的，毫无作用的示威。在大学生那里我们只能找到纯粹的伪政治意识。他们成为被幽灵般的官僚操纵的那些垂死的机构（如法国所谓的共产党及法国全学联）最理想的基层力量。这些机构全面地安排他们的政治立场。就算有时出现一些“自发”的、“独立”的思想，不必多久就会被重新纳入那种未被怀疑过的程序里。那个所谓“共产革命青年”（J.C.R.）的组织——事实上既不年轻，又不革命，更非共产——他们的行动自以为与众不同，标新立异，

而实际上他们不过胡闹地人云亦云，跟着乱喊教皇的口号——越南和平。

大学生以反抗戴高乐的落后主义自傲，却不明白他们用以反抗的武器是那些加了糖衣的斯大林主义——陶里亚蒂、贾鲁第、赫鲁晓夫、啥啥啥等流行思想。其实这等思想根源于一些更可怕、更陈旧的政治错误。因此，大学生虽是青年，实际上比当权政府更古老顽固。最起码，戴高乐的政府对现代社会还有足够的了解来统治它。

但是大学生不只犯着这个时代错误，置身在落后思想里。他们还认为必须有一套观念，可以解释世界上任何事物，赋予他们日常行动的意义。因此他们成为腐朽教会的猎物。他们死抱着那些陈年裹脚布不肯放手；更认为那些史前宗教的残余能充实他们自己及他们所处的时代。大学生圈子，像乡下老妇人的圈子一般，是宗教气氛最浓的地方，也是一个最好的传道处。传教士毫无顾忌地对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施以精神上的强奸，而在这社会上的其它地方，人们却已把传教士当过街老鼠般打跑了。

平心而论，当然大学生之中亦有聪明的，他们毫无困难地通过把那些庸材弄得头昏脑涨的考试制度。因为他们了解这个社会系统，轻视这个社会系统，知道他们是这个系统的敌人。他们从这个学习制度里取其最好的东西：奖学金。由于现实需要，这个系统被迫保留一个很小的、纯粹思想性的学术研究部门。这

些大学生就利用这个矛盾，不动声色地把煽乱的种子带到最高层。他们比那批制度下的走狗要聪明；思想上比这些走狗强，所以他们能公开地藐视这个系统。这些大学生事实上已是未来革命的理论家，就在目前他们也毫不顾忌地表明：他们今日这么容易取自这个系统的，将来会被用来推翻这个系统。大学生的反叛，非从反叛“学业”开始不可。当然由于环境不同，大学生反叛的需要，没有那些被直接剥削的工人来得那么自然。但是大学生，就像“戈达尔”或“可口可乐”一般，同样是现代社会的产品。因此，要反抗他们本身的极端异化，就必须反抗这整个社会。但无论如何，大学生不能以他们本身的落伍立场，来批判这个社会。现在的大学生，被填满了虚假的价值观念，生活在极端的虚假意识当中，根本察觉不到他们所受的剥削。幸而，在现代社会开始被否定的同时，到处都有青年的造反。这些反叛是对大学生行为最直接、最全面的批判。

只寻求理论在实践中的实现还不够，实践必须发展它的理论。

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昏睡与不断的反革命，这几年来我们又重新看到一个由青年人发动的新反叛时期。但是景观化社会在塑造它自己及它敌人形象过程中，强迫别人接受它解释世界及历史的各类意识形态。景观化社会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终归被认为是自然的。凡宣布这社会已经衰落的，具真实性的新论点都被当作离奇的新闻。青年一代对他们被迫接受的那种生活方式的反叛，事实上不过是一个更大颠覆的开始。这个更大的颠覆将拥抱所有越来越觉得难以生活的人们。这是一个新革命时代的前奏曲。不过当权的意识形态及其机关，习惯于颠倒事实，把这个历史运动变缩成社会性自然现象中的一个伪分类（pseudo-catégorie socionaturelle）：“青年”的概念。好像“青年”这个名词本身就带着反叛的意义。就这样把新一代的反叛，归纳为一向存在的青春期叛逆，说得好像每一代的青年都经历过同样的过程一样。当“那个年轻人开始为一个固定目标而认真工作”时，他就会和缓下来。“青年的反叛”经过了新闻界的“通货膨胀”，变成了一个只能旁观，而不能投身其中的景观。这种景观是社会系统的安全活门。这种片面的反抗，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无关重要的、暂时性的青年“问题”上，反而稳固了这

个社会。事实上现代资本主义真有这么一个“青年”问题，亦不外是青年人更容易剧烈地感受到这社会的重大危机。这一代青年是这个现代社会的优秀产物，所以他们本身也同样是现代的：要么无条件地被这个资本主义系统同化，要么予以根本拒绝。令人惊奇的倒不是青年人的反叛，而是“成年人”的颓丧。这不是年龄问题，而是历史问题。上一代经历了所有的失败，又被喂饱了革命运动那可耻的分裂时期里一切的谎话。

在最简单的形式下，全世界的“古惑仔”正以最明显的暴力来表明他们拒绝被同化。但这种抽象性的拒绝，根本没有带给他们逃出这系统里的矛盾的机会。他们本身就是这个系统下自然的消极产品。“古惑仔”是当今社会各种变态下的产物，如：大规模的城市建筑、原有价值观的腐化、越来越令人发闷的消费娱乐、人文主义警察对日常生活越来越广泛的控制、家庭经济单位毫无意义的存在等等。他们蔑视工作，却接受那些商品；他们无力购买，却渴望立即拥有广告上看到的東西。这个基本矛盾支配着他们的存在。他们被这个圈子困牢了，不能尝试追寻一个属于自己的、真正自由的时间秩序，不能组织成一个团体（不过就算有这类小型团体建立在现存社会边沿上，在这类原始组织里，必定因贫乏而产生等级。这个等级制必须依靠党与党之间的不断斗争才能存在。因此，每一个党成为一个孤立的单位，党里的每一个人也是孤立的）。为了走出这个矛盾，古惑仔们最后还是被迫去工作，

去赚钱买那些专门为他们而生产的商品。否则他们就必须违这些商品的法：去偷去抢；较高明的则对这商品社会作有意识的革命性的批评。青年反贼很容易受消费品的引诱而堕进最坏的混乱。古惑仔的出路只有两条：革命意识的自觉，或工厂里的盲目服从。

挑衅者（les provos）^①比古惑仔更为进步，是一个具雏型政治形式的团体。他们是由两类人相汇的机缘结合而成的：第一类是腐朽艺术界里一些热衷名利的废物，第二类是一批寻求自我肯定的青年造反者。他们的组合，使彼此能够进展到一个新的抗议方式。那些“艺术家”带来了一些虚玄的倾向，一些加上糖衣的意识形态；那些青年造反者拥有的只是他们反叛的暴力。自这个团体形成之初，这两种倾向就分得很清楚。那些毫无主意的大众就变成一小撮可疑领导人物的羔羊。他们分泌一种“挑衅主义”，来维持他们的“权力”。那些“古惑仔”的狂暴，非但没有转用在思想上去超越艺术，反而被修正的艺术改良主义压倒。挑衅者是现代资本主义下产生的最新改良主义——就是说对日常生活的改造——的新姿态。伯恩斯坦（Bernstein）认为社会主义能由改革资本主义社会而达成；挑衅者的领导阶层认为能够利用一些片面的改进来转变日常生活。他们却忘了日常生活的枯燥不是一个意外，而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唯有一个全面革命才能把它消

① “挑衅者”一称源自 1965 年在荷兰成立的反主流运动“挑衅”（Provo）。——编者注

灭。挑衅者选择了片面，最终接受了全面同化。挑衅者的领导人为了替自己建立一个根据，炮制了可笑的挑衅主义（provotariat，一个他们从未参与的宴会所留下的残羹——一些艺术与政治的杂碎）。据他们说，这个主义旨在反对普罗的被动化及布尔乔亚化。他们认为总体的改变无望，因此对这个唯一能推翻、超越现代社会的普罗势力亦表示绝望。普罗列塔利亚特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引擎，因此亦是它的致命大患。统治者用尽了所有能力来压制它——如党、工会、官僚、警察，因为它是唯一具有真正威胁性的力量。挑衅者根本没有明白这一点，因此亦没有能力来批评这个生产系统，只能做这个系统下的奴隶。在一场反工会的工人暴动里，挑衅者的基层参与了直接的暴力，那些领袖却躲在运动的后面。在惊惶中，他们只晓得控诉“过度的暴行”，只晓得号召和平主义：忘记他们原来的计划是挑衅当权者使其露出镇压的面目，反而说警察来挑衅他们。这种软脚蟹的“无政府主义”，不过是领导人的另一个谎话。因此挑衅者的造反基层，唯有先从反叛他们的头领开始，才能达到革命批判。这就是说必须与真正的普罗力量联手来扫除那些康斯坦特（Constant Nieuwenhuys，荷兰宫廷画家）^①、德·弗里斯（De Vries，英国警察的赞慕者）般的走狗，才能成

① 康斯坦特·纽文海斯（Constant Nieuwenhuys），前构境国际成员。1958年加入构境国际，1960年因其个人活动（如为政府设计公共装饰）与构境国际的行动方向及革命立场相悖，遂遭到开除。——编者注

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反抗力量。如果真的想改变这个世界，就必须先除去那些粉饰太平的人。

在反抗他们学术的同时，美国大学生立即对这个需要这等学术的社会提出质疑。同样地，他们对大学等级制的反抗（在“伯克利”或别的地方）一下子就肯定为对所有依据国家与经济的独裁与特权下所形成的整个社会系统的反抗。他们拒绝被同化，拒绝不明不白地被利用。他们的拒绝使人对这个失去控制的生产系统产生疑问。美国的反叛青年，虽然仍在混乱与摸索中，不过他们已开始明白必须从这个“富裕社会”的本身来找寻一个合适的革命途径。这个运动被绑在美国危机的两个比较意外的形势上——黑人问题与越南问题。构成美国“新左派”的一班小组织特别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在组织的形式上，他们对民主的要求是很彻底的；但由于欠缺颠覆性，破坏性的内容，使得他们常常陷在危险的矛盾里。由于缺乏正确的报导，他们对政治世界一无所知，对世界上实际发生的事情常存一种幻想；因此人们很容易劝服他们消除对旧政党传统政治所怀的敌意。他们对自己社会的抽象的敌意，导致他们敬仰，甚至于协助最明显的敌人：那些伪称社会主义的官僚政府如啥啥及古巴。因此在像“青年复兴运动”（Resurgence youth movement）这类组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极端的矛盾：一方面他们宣布政府的死亡；一方面却对现代最大的官僚政府——啥啥啥啥啥——所领导下的“啥啥啥啥啥”大加颂赞。同样

地，这类缺乏方针，半放任的组织，由于明显地缺乏内容，随时会掉进“小团体活跃”（dynamique des groupes）的意识中，或是被困在派系（斗争）的死路里。麻醉品的大量消耗是真实存在的苦闷的表现，亦是对这苦闷的抗议。但这正如在一个无自由可言的世界，假装追求自由；在一个已超越宗教的社会加以宗教批评一般的无稽。因此他们在“垮掉派”（Beatnik，反叛青年的右派）的圈子里找到“拒绝主义”的家园；以及对那些最荒谬的迷信（如禅、心灵论、“新教堂”的神秘主义以及其它像甘地主义、人道主义等等废物）的接受，亦不是偶然之事。在寻求革命纲领的过程中，美国大学生犯上了挑衅者的同样错误：自称为“最受社会剥削的阶级”。从现在开始，他们必须明白：他们并无异于同受全面社会压制、商业奴役的其他人。在东欧，官僚极权主义亦开始产生本身的负性力量。那儿的青年反叛尤其厉害——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察觉到：党机关报的不断控诉，及警察采用来防止它漫漾的各种手法。那些统治者叹说：有一部分的青年再也不遵守道德与家庭的程序（在这些标榜社会主义的社会里，道德与家庭仍然以最令人憎厌的布尔乔亚形态存在）。他们醉心于花天酒地，轻视工作，再不肯服从党的警察。在苏联，为扑灭这些青年流氓，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政府部门。但在这种散乱反叛的同时，另一个更有计划的反抗亦开始生根：秘密组织与地下杂志的出现，亦随着警察压制的松紧而增减。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由两个波兰青年库龙（Jacek Kuron）和莫泽莱夫斯基（Karol Modzelewski）发表的《给波兰工人党的公开信》。在这封信里，他们再三强调必须把“现存生产制度与社会关系废除”；而为了达到目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正在寻求使人发觉及了解无产阶级对官僚阶级权力批判的原因——这些批判已由东柏林、华沙、布达佩斯等地的工人的行动所具体化了。但是这个反叛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一下子谈到现实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在其它国家，反叛的行动是可能的，但反叛的目标还不明显。在东欧官僚主义下，抗议的行动不带幻想，反叛的目标也很清楚。只等人来发明践行革命的方式，开出通向实现的道路。

至于英国青年的反叛，最初始自反原子武器运动。1963年春，在一个“百人委员会”发动下，集合了30万示威者，暴露了R.S.G.6^①的丑闻。但这些片面的反叛，由于缺乏远景，结果还是给传统左翼及和平主义者的美言迷惑。英国人的特征，古板管制的日常生活，终不能抵抗现代社会的突击。传统价值的加速崩溃引起各种富革命性的倾向，对生活方式作全面批判。英国青年的革命要求必须与工人阶级的抵抗行动连结一致。英国工人，正如他们的野猫罢工所表现，是世界上最富战斗性的。因此青年与工人必须为共同的目标斗争，

① 反核运动者公开他们的表现，并且侵入供政府人员使用的极端秘密防弹室。——译者注

才能期望最终的胜利。英国工党的失势，更增进了他们的合作机会。合作后所产生的爆炸性行动将比我们在阿姆斯特丹见到的更可观；那些挑衅主义式的暴乱与它比起来简直会像儿戏。唯有如此，才能产生一个真正的革命运动，唯有在这种情况下现实的需要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①

^① 此处原有两段描述日本左翼学运的内容，但译者删除了原文本，因为他表示，“按照创势国际的意见，这次中、法、英文本中，我们删去其中关于日本的部分，因为后来证明，先前的论断都是错误的。这是由于那时候，他们对日本了解并不充分。”——编者注

破釜沉舟，让局面再也无法反转。

“先锋意味着与现实同步”（《构境国际》第8期），现在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对现代世界的全面批判，不单单要针对过去的事实，面对现在，还要考虑将来的转变。如果要道出目前世界的实况，要计划它全面的颠覆，我们就必须能够暴露所有被隐藏的历史。换句话说，就是要以一种切实的批判眼光来观察一世纪前由西方无产阶级发起的国际革命运动的历史，并且评论它的“得”与“失”。“这场反对旧世界一切组织的运动已经结束很久了”（《构境国际》第7期），同时也失败了。它最后一个历史性行动是西班牙普罗革命的失败（1937年5月在巴塞隆纳）。不过官方的“失败”，与官方的“胜利”并不代表什么，我们必须从革命的事实及其后果上来论定。因此我们可以说：“有些失败实际上是胜利，而有些胜利比失败更可耻。”（卡尔·李卜克内西被刺杀前夕语。）普罗的第一个“大失败”——巴黎公社，事实上是它的第一次大胜利。因为这个初生的无产阶级，第一次证实它有自由操纵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历史能力。同样地，它的第一次“大胜利”——布尔什维克革命，实际上却是最具严重后果的失败。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与国际反革命运动的开始相吻合；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粉碎了斯巴达克派运动。这个共同

的胜利，证实了他们虽然表面相争，但其实是一鼻孔出气的。这个布尔什维克组织，实际上是旧势力的一个特殊武装。俄国反革命的结果是：在内设立了一个新的剥削方法——官僚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外增设了伪共产国际的支部。这类分店是用来保卫并扩张它本身的政权。资本主义在官僚及布尔乔亚两个形式下，从新开始繁殖在克郎士达脱水手、乌克兰农民、柏林、基尔、都灵、上海以及后来的巴塞隆纳工人的尸体上。

由布尔什维克制造的第三国际，很明显地是被用来对付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改革派残余的。这个将各国普罗先锋队集合为“革命共产政党”的第三国际，太受它的成立者——只顾本身利益的布尔什维克——势力影响。因而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够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事实上，第三国际就是从第二国际的同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一开始，西方的工人组织就被迫接受苏联的模型。这些组织的发展与苏联政权是同一回事。在苏联，官僚的专制独裁，造成了一批新的统治阶级。在西方，这些组织就被控制在一批政党与工会的官僚手上，他们的利益与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有明显的冲突。斯大林的魔影继续纠缠着工人的意识，而正在官僚化及过度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已解决它的内在危机，并骄傲地肯定它的新胜利（自夸为永久的胜利）。一些看来相异实则相同的社会形式占据了这个世界。旧世界的准则继续统治着我们的这个现代世界。这一代还是活在上一代的鬼影下。

就在这个世界里，很多伪称革命的组织，站在旧势力的立场上，故弄玄虚地对旧世界作形式上的反抗。他们所倚仗的都是些硬如化石的意识形态。事实上他们在协助巩固当权势力。由工人阶级铸成，用来自我解放的政党与工会，现在成了系统里单纯的调节器，成了领导人的私人财产，被利用来达成他们私人的解放。这类人根本没有想到要去推翻这个给他们以领导阶级地位的社会。这些工会与政党的纲领，不过是不停地重复大唱其“革命”高调，而实际上进行披上糖衣的改良主义——资本主义本身就是正式的改良主义。在他们能够夺到政权的地方——诸如那些比苏联更落后的国家——他们所能够做到的不过是依照斯大林的模式，建立一个反革命的极权^①。在别的地方，他们成了官僚资本主义自动调节器里一个必须的、固定的零件^②；成为资本主义保留人道警察的绝好借口。另一方面，在工人群众面前，他们成了反革命官僚的永久保证人与无条件的护卫者——苏联外交上温顺的工具。在这个根本上骗人的世界里，他们是最厉害的骗子，为延长经济与政府的无所不至的极权而工作。就如构境者再三强调：“在一个全部自动调节的极权社会模型里，只能存有一些表面的虚假抗议，抗议本身就来自

① 他们总是走剥削农民、积累资产，达成工业国的老路。——译者注

② 四十五年来，法国的伪共党，没有作过一步夺权的行动，其它没受红军侵犯的先进国家的共党亦如是。——译者注

局限在同一系统里的幻象，这反而巩固了这模型。这些伪社会主义的官僚仅是充满异化工作的旧等级制世界的一个最壮观的伪装而已。”学生的工会主义也不过是这个怪象里的另一个怪象——一个已经变质的工会主义滑稽而无用的重复。

所有未来的革命组织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立场——在理论上与践行上，对各种形式的斯大林主义的控诉。以法国为例，经济上的落后，延迟了危机意识，革命运动只能在斯大林主义化为乌有后才能重生。因此，“消灭斯大林主义”必须是“新世界史”前的最后一场革命里重复不断的口号。

这场革命运动必须与它的过去完全断绝关系，从未来取其诗意。那些死灰复燃，在各种左翼小团体里玩弄他们“战斗思想”的“布尔什维克”仅是过去的残渣，怎样也不能预示未来。那“被背叛的革命”就像一只遭难的船。这些船沉下后的残骸，自称为正宗布尔什维克的忠诚拥趸：保护苏联是他们唯一的忠贞，亦是他们可耻的辞职书。他们唯一可以存有幻想的地方是那些落后国家，因为他们对经济落后那套理论并不持异议。在第四国际里里外外，从《游击队》（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派调解后的机关报）至一切自认正宗“托派”的各种倾向，或半倾向都同受一种空头革命家式的意识形态统治。不论在践行或理论方面都不能了解现代社会里的问题。四十年的反革命，使他们与“革命”分开。他们错了，因为这已不是 1920 年；况且在 1920

年他们已经错了。“社会主义或野蛮”这个极左派，在它分裂为两派——“现代主义卡丹派”（moderniste cardaniste）与“老马克思主义工权派”（vieux marxiste de Pouvoir Ouvrier）——后的解散，证明了革命必须追上时代，而时代思想必定来自重新发明的革命批判。革命运动与时代思想的分裂，使到革命要就被送进收藏革命的博物馆去，要就跌进现代化的反革命政权里。

至于其它“无政府主义”的小集团，他们全都成了这个只剩下一个商标的意识形态之奴隶。那不可思议的“自由世界”（Monde Libertaire）——无疑是由学生编的刊物所鼓吹——达到了极端荒谬的程度。因为他们互相容忍，所以结果这批人实际上容忍了一切。

这个以不断现代化为傲的当权社会系统，现在必须面对要交手的对象——产自它本身的现代化反抗力。“让那些死者去埋葬，去哀哭他们的死者吧。”（《构境国际》第9期）要把革命思想上的阴影除去，必须切实地揭开历史运动的种种玄虚。在日常生活的革命方面还有很艰巨的任务要完成呢！革命，就像它宣告的新生活一般，必须由我们重新创造。革命纲领基本上还是一样：铲除阶级社会——因为产生这种社会的情况还继续存在。但鉴于前车，这一次必须要彻底去干，免得片面的实现带来社会的新分裂。

新无产阶级对当权者的斗争非全面地进行不可。将来的革命运动本身就必须废除一切倾向制造异化货品的商业系统。它必须对这种系统不断否定，不断批

判，才能超越这个旧世界。卢卡奇（Lukacs）说得对：革命组织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人与历史的中介，工人大众与已成团体的无产阶级之间的中介。（卢卡奇错误在认为布尔什维克能够负上这个任务。）各种倾向与理论上的分歧必须立即变为组织上的问题，才能走上实现的道路。革命组织的问题是新革命的最后审判。革命计划的成败关键在于这个新的革命组织是否符合一世纪来无产阶级的经验：在世界各地成立拥有绝对权力的“工人理事会”（conseils ouvriers）。这样的组织，必须彻底批判所有造成这个（被它反对的）世界的东西：如商品的生产、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国家及由国家压迫造成的各种异化。

理论与实践的分离是过去革命运动碰壁的主要原因。只有极少次数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超越了这个分离，找到革命真理，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组织能跳越这高墙。

不论怎样“革命”的意识形态，总不免受役于当权者；这是一个警钟，告诉你化了装的敌人来了。因此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才是革命组织问题的中心。只有一个异化的世界才会产生谎言。假如一个标榜“社会真理”的组织以骗人的手法来进行它的“革命”，那么它不过是这骗人世界里的另一个骗子而已。

这个计划实现具绝对权力的“工人理事会”的革命组织，本身就须是“工人理事会”的草图，并具有它的一切优点。因此它须对列宁的组织理论反抗到底。1905

年的革命及苏联工人自动组织的苏维埃都是对列宁这个荒谬理论在事实上的批判。^①但是布尔什维克运动一直坚持相信工人的自动自发不能超出“工会”的意识；亦不能掌握与了解革命的“全面”。这就等于斩了无产阶级的“头”，由党领“头”来革命。假如我们像列宁那般来怀疑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历史力量，我们就不可能相信他们有管理将来社会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权力归苏维埃”这个口号，所代表的不过是党征服了苏维埃，也就是说设立了一个党政府来代替那原应该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一个逐渐消亡的政府。

可是我们仍须重用这一个口号，这一回却要把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彻底清除。无产阶级醉心于革命这个游戏，为了它能赢得整个世界——不然的话它也就什么也不是。“普遍化的自治”是表达无产阶级力量的唯一形式。无产阶级权力不可能与任何其它权力共存。因为普遍化的自治就等于让其它各种权力解体。“普遍化”并不受地理或任何其它限制。假如它接受妥协的话，这些妥协立即成为损害的行为，是变相的辞职书。“自治”必须同时是现在这个斗争的目的与方法；它不仅是现在斗争的形式，亦是其最终的理想。

对这世界的全面批判保证了革命组织的真实性与协调性。容忍压迫系统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存在（因为他们披上了“革命”的羊皮）就等于承认压

^① 罗莎·卢森堡已对其作理论批判在先。——译者注

迫是合理的。同样地，一个革命组织如果容忍社会生活中其中一项异化亦即等于承认了社会上所有东西的物化是注定的。我们单单赞成工人理事会的抽象力量还不够，还要显出它的具体意义：如废除商品的生产、取消无产阶级存在的环境。商品逻辑成了目前各种社会的最终真理，它是这类看来相异实则相同的社会里，全部的自动调节之共同根基。商品物化是全面解放的绊脚石，亦是建造新生活的根本障碍。在商品生产的世界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不能自主地依一个固定目标来发展，而须受外部力量的指引。经济定律看来好像成了一种特别的自然定律，其原因在于置身其中的人缺乏自觉意识。商品生产的原则在于使人在创造一个无法控制的世界的混乱过程中迷失自己。而“普遍化自治”这个革命的核心思想，相反地使人对生活各方面作有意识的导理。但假如自治的对象，还是这些令人异化的货品，“自治”仅是替自己安排一个半死不活的生命而已。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因此工人理事会的任务不是自治这个现存社会，而是不断改变它的性质：使这个社会——人类在建设自己的历史中一个大弯——被另一个新的社会代替。

超越商品世界，就等于说取消工作。工作将被一种自由的新活动代替。因此现代社会里一个基本分裂（越来越僵死的工作与被动的消费娱乐之间的分裂）将被消除。今日在解体的一些小组织如“社会主义或野蛮”、如“工人权力”，虽然还叫着工人权力等现代口号，

实际上还是走工作革新，工作人道化等老运动的路线。今日我们必须铲除工作，而不是改革工作。这并不是“乌托邦”的想法。因为消除工作是超越这个商品世界的第一个条件；亦是废除日常生活中，“自由时间”与“工作时间”的分离——“实际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内在矛盾下产生的异化情形——的最重要条件。唯有超越了这些困难，人类才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同时在这个由他创造的世界里找到自我。“工人理事会”的民主是解决现存各种分离的根基；由于它的存在，再也不可能有存于个人之外的办法。

革命的计划很简单：使人对他创造的历史有所主宰。现代历史，像已往历史一般，是社会现实（理论化后）的产物；也就是说，是人类所有无意识的活动之结果。在它全面专权时代，资本主义发明了一种新宗教——景观。景观是意识形态的地上结晶，这个世界从来未有这样地颠倒并走得这么快。“就像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今日对景观的批判，成了所有批判的第一条件。”（《构境国际》第9期）

革命的问题，自人类历史开始就有了。物质与技术上越来越大的积累，不过使得人类的失望亦越来越深厚而已。布尔乔亚及其继承人——东欧的官僚，不晓得利用这高度发展的科技来创造一个如诗的未来。为了死命地保持原有制度，反而利用这高度的发达来制造更大的压迫。他们只愿积累资本，但受剥削的无产阶级亦跟着增加。普罗是指那些已发现自己无权支

配自己生命的工人。新无产阶级的历史机会是使自己成为这些在布尔乔亚社会里无价财富的承继者，再利用这些财富来使自己成为征服自然的完全的人，创造一个新世界。人性自然的实现只能有这样的意思：人类欲望无穷地解放，愿望的全面实现。这些真实的欲望，在现在是被景观化社会压制在一个角落里。为了达到真实欲望的实现，我们必须消除极权系统为维持它权力而作的日常生活的虚假需要、虚假欲望。我们必须消灭整个商业景观。

现代历史的解放，只能依靠那些被它压迫的工人；唯有他们才能自由地利用世界上积累的无穷财富。在十九世纪时，无产阶级已经是哲学的承继者；它现在更成为现代艺术的继承人，亦是日常生活的第一个有意识的批判者。在未能实现生活的艺术与哲学以前，它不能自我消亡。改变世界与改变生活是同一件事，亦是不能分离的口号，直到无产阶级已无存在的理由而自我消亡，直到这个由“需要”统治的社会变成自由统治的社会。它最重大的计划是彻底地批判，自由地重建以前那些被异化的现实强加于身的，各种行为与价值。在建造生活的每一时刻中，每一事物中，所产生的创造力才是它唯一能承认的诗。这是每一个人的诗，是革命节庆的开始。无产阶级的革命如果不是一个节庆的话，就什么也不是。因为它预示的新生活，将在节庆的信号下创生；游戏就是这个节庆的终极原则，唯一的规程是不要活在死的时间里，要纵情、纵

性、纵欲，毫无顾忌地去享乐。

附录

告全体劳动者

激愤派与构境国际委员会、维持占领理事会

1968年5月30日，巴黎

（转译自英文，原文是法文）

同志们：

我们在法国已经干下的事儿正在困扰着欧洲，并将很快威胁到世界上所有的统治阶级，从莫斯科和啥啥的官僚到华盛顿和东京的百万富翁。就像我们让巴黎起舞一样，国际无产阶级将再次对所有国家的首都和所有异化的堡垒发起进攻。占领全国各地的工厂和公共建筑，不仅使经济运作停顿下来，还带来了对社会的普遍质疑。一场强烈坚定的运动正在引导几乎每个阶层的人寻求生活的真正转变。这是一场革命运动的开始，这场运动除了意识到它为了胜利而已经做出的事儿外，它不缺任何东西。

什么势力会试图拯救资本主义？政权将会垮台，除非它威胁要动用武器（同时承诺进行新的选举，而这只能在运动投降后进行），甚至立即进行武装镇压。如果左派上台，它也会试图通过让步和武力来捍卫旧世界。这样一个“民众政府”的最佳捍卫者将是所谓的“共产党”，即斯大林主义官僚的政党，它从一开始就与运动作斗争，只是在意识到自己不再有能力成为该政权的主要监护人时才开始设想戴高乐政权的垮台。

只有在斯大林主义者被击败的情况下，这样的过渡政府才能真正成为“克伦斯基主义”。这一切最终将取决于工人的意识和自主组织的能力。已经拒绝了工会领导人所乐见的荒唐协议的工人，只需要发现他们在现有经济框架内无法“赢得”更多东西，而他们能够通过以自己的名义转变经济的所有基础来拿下一切。老板们几乎不可能付出更多；但他们可以消失。

目前的运动并没有因为超越了关于工资和养老金的悲惨的工会要求而变得“政治化”，这些要求被虚假地表述为“社会问题”。它超越了政治：它在简单的事实中提出了社会问题。已经酝酿了一个多世纪的革命正在回归。它只能以自己的形式表达自己。现在进行官僚革命式的修补已经太晚了。当最近像安德黑·巴赫乔内（André Barjonet）这样的去斯大林化的官僚呼吁成立一个共同的组织，团结“所有真正的革命力量……无论他们是在托洛茨基还是猫的旗帜下前进，在无政府主义还是构境主义的旗帜下前进”，我们只需要记住，那些今天跟随托洛茨基或猫的人（更不用说可怜的“无政府主义联合会”了），都与当前的革命毫无关系。官僚们现在可能会改变他们对所谓“真正的革命”的看法；真正的革命不会改变它对官僚主义的谴责。

在目前，以他们所掌握的权力以及政党和工会的现状，工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把自己组织在统一的基层委员会中，直接接管经济和社会生活重建的所有方面，相对于任何形式的政治或工会领导，主张自己的

自治，确保自己的自卫，在地区和国家上相互结成同盟。这样一来，他们将成为国家唯一的真正权力，即工人理事会的权力。唯一的替代方案就是回到他们的被动状态，回去看电视。无产阶级“要么革命，要么一无所有”。

理事会权力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 所有外部权力的瓦解
- 直接和彻底的民主
- 决策与执行的实际统一
- 可以在任何时候由授权者撤销的代表
- 废除等级制和独立的专门化
- 自觉管理和变革解放性生活的条件
- 永久的创造性的大众参与
- 国际主义的延伸与协调

目前的要求不外乎如此。自治也不外乎如此。小心所有现代主义的加盟者——甚至包括牧师——开始谈论自治，甚至谈论工人理事会，而不承认这个最低限度，因为他们想保存他们的官僚职能、他们的知识专业的特权或他们未来当小老板的职业！

实际上，从无产阶级革命项目一开始，现在所需要的东西就已经是必要的了。这一直是一个工人阶级自治的问题。斗争一直是为了废除雇佣劳动、商品生产和国家。目标一直都是顺应有意识的历史，压制所有分离和“独立于个人而存在的一切”。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自发地在理事会中勾勒出它的恰当形式——1905

年在圣彼得堡,1920 年在都灵,1936 年在加泰罗尼亚,1956 年在布达佩斯。旧社会的保持,或新剥削阶级的形成,每次都是在理事会的尸体上进行的。工人阶级现在知道自己的敌人和自己恰当的行动方法。“革命组织必须明白,它不能再以异化的形式来对抗异化”(《景观社会》)。工人理事会显然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因为所有其它形式的革命斗争都导致了与目标相反的结果。